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根源初探

张国，吴雪

（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生部，北京 100091）

[摘要]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思潮，也是一场运动。冷战结束后，此起彼伏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成为影响当今国际形势安全与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原因，从国际体系层次来看，是冷战格局的解体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负面影响；从国家层次来看，是有关国家民族政策的失误、历史遗留问题的后遗症和外部势力介入造成的不良后果；个人层次的原因是以个人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发生了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变化。

[关键词] 民族主义；民族分离；认同

[中图分类号] D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4)04-0006-05

在过去的20世纪里，世界经历了民族主义三次浪潮的冲击，其中尤以两极冷战格局结束以后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最为引人注目。这次民族主义浪潮不仅范围广、规模大、冲突烈度强、形式多样，而且几种新旧不同类型相互呼应，彼此影响，高潮迭起，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现实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猛烈冲击。关于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原因，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本文拟从国际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层次对此分析。

一、国际体系层次的原因

从政治方面讲，冷战后两极格局的瓦解为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二次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中，一方面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本确立了一系列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和准则，如主权平等、民族自决、不干涉内政等，在这些原则指导下，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赢得了民族解放，殖民体系基本瓦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求——建立民族国家，最终在全世界范围得到实现。另一方面，以东西方对抗、美苏争霸和军备竞赛及美苏在第三世界争夺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维持了近半个世纪，两大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方位对抗使民族主义受到压制，并一度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特别是在苏联直接控制的中东欧更为明显。但事实上，民族主义在两大集团内部暗暗滋长。

两极格局的瓦解造成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不复存在，其在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随之迅速减弱，而遭受其长期压抑的民族矛盾顿时上升为突出问题，民族主义急速膨胀，最终导致在前苏联势力范围内涌起一股势如狂飙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在中东欧，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整个巴尔干地区因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等民族跨国居住而形成的民族矛盾酿成了错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综复杂的边界争端，继续分裂或要求与母国合并，使该地区再次成为欧洲的火药桶。正如陈乐民指出的那样，“这次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瓦解的情绪化反应，是冷战格局崩溃后新形势的必然产物。”[1](P.273)

从事物的另一方面看，冷战的结束，苏美实力的一消一长所造成的后果并非只在前东方阵营内出现。在西方阵营，制约民族矛盾的冷战机制的瓦解，“共同敌人”苏联的消失，使美、欧、日三大力量中心争斗加剧，以贸易战、投资战、金融战形式出现的经济民族主义高扬，因中东欧等地区大量难民和移民的涌入而萌发的排外主义滋生。在西方国家内部，由于苏东地区民族主义狂潮的辐射和刺激，地方分立分权甚至分离主义浪潮普遍呈现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等一大批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社会一时间未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对其进行制约。美国到处以“世界领袖”自居，以自我为中心和标准，到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武装入侵，扮演了“世界宪兵”的角色，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从而直接刺激了许多国家尤其是伊拉克、古巴等国民族主义的高扬。[2](P.301)目前伊拉克国内强烈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正是一个现实的例证。总之，“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的每一次高涨都同国际政治格局的演进如影如随，它是国际政治变革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这一变革的进程。”[3](P.23)

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旧经济体系不合理性的负面影响激发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在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为内容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境地。一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存在。发达国家垄断高科技产品的工业生产，发展中国家则作为它们的原料、低级工业品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发展中国家由于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单一性经济结构及薄弱的科技实力而长期处于被动的依附地位，这样发达国家就获得了高科技垄断利润。二是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存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80年代以后的贸易已不再反映传统的比较优势，它反映的是因规模经济或技术上的突出地位而带来的优势。这就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单一型初级产品在世界市场中获得平均利润的可能。在帝国主义时期，依靠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及殖民地，发达国家经济规模和科技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规模效益和科技的高附加值使得国际贸易利润滚滚流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及利润日趋萎缩。三是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存在。发达国家以高价资本对抗发展中国家低价的原料和劳动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70年代以来，多数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正式”选择了资本主义，并向国际资本敞开大门。国际资本因此迅速扩张，资本运作能力空前加强。全球性吸纳资本竞争的加剧，使得资本在和劳动力及原料的对抗中，变得越来越有利，而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劳动力价格则大幅下跌。[4](P.21)

这种旧经济体系不合理性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贫困、债务、失业、通货膨胀等陷于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从而为民族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蔓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二、国家层次的原因

1. 有关国家民族政策的失误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种族、语言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千差万别，彼此间往往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许多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出现一系列严重失误，致使民族矛盾加剧。有的国家中央集权过重，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权实际上被剥夺。有的国家无视民族发展规律，推行单一的主体民族同化政策，背弃民族平等原则而执行大民族主义。对于民族矛盾的解决，往往是简单粗暴，有时甚至采取武力镇压手段。在经济发展方面，许多国家在资金调拨、资源分配、产业结构、贸易管理上存在排挤或偏袒某些民族倾向，致使不同民族聚集的各地区经济发展上不平衡而引起民族矛盾的增多和加剧。[5](p.56)在前苏联，自20年代末列宁过世后，逐步推行事实上的中央高度集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权的国家体制，使苏维埃联邦国家体制严重变形。在政治、经济上，加盟共和国丧失应有的自主权。在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关系中，突出了俄联邦共和国的特殊地位，实际上使其它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仅相当于俄联邦的边疆区和州一级地方党组织，其它加盟共和国中央政府仅相当于俄联邦的边疆区和州一级地方政府，使俄罗斯民族处于特殊地位，背离了民族平等和联邦制原则。[6](P.98—102)在土耳其，历届政府和政治家都不承认库尔德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认为库尔德人是“土耳其”部落，“不是少数民族而是纯粹的土耳其人”，“在这个国家里，只有土耳其民族才可以要求民族权利，其他人不能有这种要求”。[7](P.89)而在前南斯拉夫，从铁托时期的抑塞分权到铁托逝世后的扬塞集权走了两个极端，使少数民族在心理上难以接受，结果激化了民族情绪，使民族矛盾升级。

2. 历史遗留问题的后遗症

“历史往往是现实的注脚，现实只有在历史的衬托下才能进一步丰富其含义。”[8](P.327)冷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问题成为热点，大多是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留下的祸根。在近现代，西方列强出于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有意识地在殖民地采取种种分化政策和转嫁危机的措施，往往起到挑拨离间、制造仇怨和相互制约的作用。这一点不但体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欧和非洲地区的民族和领土划分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全面崩溃过程中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建国运动的干预方面，其严重恶果便是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积怨甚深的民族矛盾和教派隔阂。这在当今一些国家和地区冲突中十分明显。欧洲巴尔干地区历史上受到过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肢解，多次的战争造成诸多的领土问题和民族之间的纠纷。冷战结束后，由于失去了能控制该地区的主导力量，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引发了民族之间的新冲突。同样，南亚印巴因为英国殖民主义埋下的祸根——克什米尔问题而冲突不断，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死结”。而西方殖民主义领土分割和边界划分，在非洲留下部族冲突的恶果更加严重。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争夺和瓜分非洲时，根本不考虑河川、湖泊、山岭等天然边界及部族的分布情况，而是根据各自的实力和利益，人为地划定势力范围，这些势力范围的边界演变为当今非洲国家的边界，其结果形成许多同一部族被分割在不同国家里，而有些国家又不是按照民族聚居传统集中了许多原本差异很大的部族，这就为日后这些国家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内部的部族冲突埋下了祸根和火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非洲各国政局更加动荡不安，邻国之间部族冲突也一直不断。

3. 外部势力的介入

冷战后民族主义纷争的兴起，从一开始就与一些西方国家谋求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的意图联系在一起。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和价值观出发，对相关地区的民族事务横加干涉，致使民族冲突愈演愈烈。在波黑，德国、奥地利等出于加强自己势力范围的考虑，率先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独立；而美国则出于对塞族社会主义性质政权的不满，积极支持穆斯林的武装斗争，并不惜容忍伊朗、阿富汗等国的激进伊斯兰分子进入波黑协助作战；俄罗斯则出于维护自己传统影响的考虑，尽力支持塞尔维亚。于是一场本来是三兄弟分家的“内部”纠纷演变成为一场血腥的种族战争。时至今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自己的利益，不惜挑起相关地区的民族冲突和种族屠杀，甚至肢解他国，以便从中渔利，为己所用。如美国的欧亚战略是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以地缘政治多元化为手段，遏制中国、俄罗斯等潜在对手，控制欧洲、日本等传统的盟友。为了实施这一战略，美国对冷战后欧亚大陆中间地带所出现的民族冲突、分裂主义运动等采取了不同的策略。[9](p.32)为肢解或削弱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波罗的海三国同情、支持甚至制造民族冲突；为消除地区强权，在科索沃和伊拉克支持民族分裂活动；为保护战略地区的稳定，在外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抑制民族分裂活动；为保护盟友，在土耳其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这种外部势力的介入有时虽然可以暂时缓解民族热点问题，但并不有利于最终公正、合理地解决民族冲突。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个人层次的原因

个人层次的原因，主要是相关国家的以个人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发生了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变化。

认同的概念出自于社会心理学，其定义可概括为在某种情景下，行为体在与他者的比较中产生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认同可以有个体认同，也可以有集体认同。根据社会学的研究，社会团体通常建立在有利于其成员进行积极联系的一系列观念基础之上，这些观念可以直接地通过成员间的话语体系和他们交往、沟通的方式中表现出来，也可以间接地通过共有的象征、符号和标志得到体现。这些观念的作用就在于使该团体区别于其他群体，从而能够使其成员感觉到他们是相同的。[10](P.19)

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认同对于群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群体借以团结其成员的核心力量，而且是一个社会组织机构凭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依据。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个人常常同时归属于多重社会群体，因此他的自我认同必然是多重性、多层次的，每个人的认同都是多重性的统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民族国家只是诸多群体组织形式中的一种，因此，国家认同始终只是人类多重性认同中的一个层面。[11](P.1—2)

从人类历史看，虽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是一个重合的概念，但是两者却难以分割。国家具有民族的特征，民族具有国家的要素。国家的民族特征表现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植根于民族之中，从民族中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牢固的文化认同。国家的性质会发生历史的变迁，政府会更迭，但国家的民族性却难以改变。反之，民族又依赖于国家，因为只有国家，凭借其特有的力量与功能，才能真正维护民族的生存与利益，捍卫民族的独立与尊严。[12](P.470—471)这种关系表现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会出现两个方面的情况，一种是如果单一或主体民族占绝对优势，这两个认同就容易成为一个认同；一种是如果是多民族或几个强大的民族并存的国家，这两个认同就会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敏感境地。它或许会使国家与民族利益统一起来同仇敌忾，或许会使国家与民族利益尖锐对立而分崩离析；结果，或许会导致一个强大国家的出现，或许会使原来强大的国家陷于分裂。[13](P.9)

冷战后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从个人原因看，大多是相关国家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关系没有处理好，个人认同出现了“迷茫”。如在苏联74年的历史中，其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一再声称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赫鲁晓夫还认为“苏联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14](P.9)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曾确实形成过苏联认同感，特别是在其国力比较强盛时，在人们心中产生过身为超级强国一分子的骄傲。但由于各方面原因，苏联没有成功地将不同的民族融入苏联体系，大部分民族无法在人为构建的苏联联邦体制中找到国家认同。在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出现混乱后，这种根基不牢的认同感就迅速消失了或淡化了，对“我是谁”、“我们是谁”进行了重新定义。要构建新的认同的东西需依赖他们记忆中的基本组织：家庭、社区、乡村的历史、甚至宗教，而最重要的，则是民族。这种民族认同是在混乱世界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我是乌克兰人、我是俄罗斯人、我是亚美尼亚人。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竟于74年之后无法创造国家认同”。[15](P.43)在个人层次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淡化或消失了，原来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也就削弱甚至消失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民族的信仰受到挑战或者质疑，在民族认同的范畴就会出现危机。当民族认同不再是一个国家整合社会的力量源泉，可能就会有新的社会力量兴起，经过社会运动，或改良，或革命，以国家的方式建立新的认同。”[16](P.38—39)

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中，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其具体表现在这些多民族国家中，民族矛盾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化解。民族分离的趋势以连锁反应的方式继续发展。如在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格鲁吉亚，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要求脱离格独立，虽然冲突双方已经和解，但矛盾不会在短期内得以解决，始终是困扰格当局的最大难题。

民族主义在冷战后的大范围兴起是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的，仅仅因为单一原因而导致民族主义的产生的情形并不多见。对于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民族问题而言，其起因也是各不相同的，许多问题既有体系层次的原因，也有国家和个人层次的原因。当具体考察某一问题时，要从各种层次的角度进行分析，才不致于以偏盖全，获得真正符合实际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陈乐民.“冷战”后欧洲的若干问题[J].西欧研究，1992(6).

[2] 程人乾.涡流——20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

[3] 焦统骞.国际政治中的民族主义剖析[J].欧洲，1994(6).

[4] 徐文付.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解读现代民族主义浪潮[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9(9).

[5] 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6] 许新，陈联璧，潘德礼，姜毅.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 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8] 资中筠.冷眼向洋(下)[C].北京：三联书店，2001.

[9] 潘志平.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10] 李明明.试析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认同[J].现代国际关系，2003(7).

[11] 钱雪梅.论文化认同的形成和民族意识的特性[J].世界民族，2002(3).

[12] 蔡拓.全球问题与当代国家关系[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13] 吴楚克.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4] [美]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C].刘靖北，刘振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5]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6] 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双木）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